

# 《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的异同及其原因

李静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本纪,对吕后事迹的描述基本相同,但在具体形象刻画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笔下的吕后,既有女性的隐忍和刚毅,也有女主的才华与残忍;后者笔下吕后的女主和帝后身份是分离的,身为女主的吕后才干卓著,惠民利国,身为皇后的吕后则残忍刻毒,权欲熏心。共有的实录精神,使司马迁和班固在记载吕后事迹时基本相同,而二人生活时代、个人经历、修史目的的不同,则是造成二书中吕后形象存有差异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史记;汉书;吕后

**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3-0071-03

《吕太后本纪》是《史记》中唯一一篇单独为女性所作的传记,《高后纪》则是《汉书》中唯一一篇非帝王而位列本纪的帝纪,足见司马迁和班固都注意到了吕后在汉初重要的政治地位。身为一代女主,吕后有着普通女性所没有的卓越才干,但身为女性的她,却始终因性别被时人和世人另眼相看,因此,《史记》《汉书》将吕后列入本纪之中,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 一、《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的异同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中说:“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sup>[1](P74)</sup>《史记》中唯一一篇女性传记便是为吕后而写的,可见司马迁对吕后的看重。他笔下的吕后是一隐忍而刚毅的女性。在她嫁给刘邦前,刘邦就有了曹姬,且生有长子刘肥,而吕后能与刘肥平安相处数年,足见其隐忍的性格。成为刘邦妻子后,在刘邦与项羽楚汉对峙时,吕后在承担繁重家务照顾年老公婆的同时,还要忍受与丈夫长久分离之苦,接受刘邦另有新欢的残酷现实,甚至被项羽抓去当人质。司马迁不仅刻画了吕后的隐忍性格,还描画了她善良和刚毅的品行。《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酺

之。”<sup>[2](P346)</sup>在面对戚夫人凭借刘邦之宠向她挑战皇后之位时,吕后并没有失声痛哭,也没有跑去向刘邦求情,而是向张良求计,得商山四皓,保住了太子之位,表现出高于平常女性的冷静和刚毅。《吕太后本纪》言其“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sup>[2](P396)</sup>。《吕太后本纪》有意淡化吕后诛韩信、彭越等描写,而着重刻画其隐忍刚毅的性格,足见司马迁对吕后政治才干的关注。司马迁笔下的吕后还是一个聪慧却残忍的女主。惠帝死后,吕后进一步突破封建伦理束缚,正式临朝称制,迫害刘氏皇子,大封诸吕。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女性只要掌权,便是牝鸡司晨,不能被容忍;但司马迁透过封建男权的绝对统治,以敏锐的眼光,将这极具政治才华的女性写进史书,足见其不以人物性别身份立论,看重人物实际才华和影响力的史官立场。不仅如此,《吕太后本纪》末还以“太史公曰”的方式评价吕后的政绩:“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sup>[2](P412)</sup>司马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充分肯定吕后的执政功绩,见出其历史记录的客观性和人民性。司马迁认为,“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这是对汉朝结束战国分离之势,实现大一统

收稿日期:2018-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xzw010)

作者简介:李静(1993-),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

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司马迁又如实记述了吕后对戚夫人非人的迫害,并对这非人的行为予以批判,绝不因其地位之尊而为其曲笔隐瞒。将吕后这一独特的政治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客观记载其功过是非,且能公允地评价其一生功过,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

班固笔下的吕后首先是一位惠民利国的女主。和司马迁一样,班固也看到了吕后在汉初对汉朝政权的实际掌控和她称制期间所显露出的政治才干,将吕后写进本纪之中,肯定了她在汉初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在《高后纪》中,班固只是将吕后看作刘邦的妻子,冠以“高后”之称,可见班固受传统伦理思想影响十分深刻。他曾言:“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sup>[3](P376)</sup>《高后纪》主要记载的,是吕后在惠帝死后称制天下八年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政令,解决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带来的问题,以及面对匈奴的骚扰和入侵,维持汉朝平稳统治多年的政绩,突出了吕后的政治才干,而将吕后在称制前残忍毒杀戚夫人,报复赵王如意等许多令人发指的行为移出《高后纪》。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班固为尊者讳的思想。正因为如此,《高后纪》中虽也记录了一些吕后的秽政,如幽囚废黜前少帝,幽囚致死赵王刘友,但由于班固只是平实地记录这些史实,不带个人主观情感,因此,人们在读《高后纪》时,并不觉得吕后残忍刻毒,反而觉得其极有政治才干。其次,班固笔下的吕后又是一位残忍刻毒的帝后。在《外戚传》中,班固详细记载了吕后和刘邦诸嫔妃间的关系,及其大封诸吕为侯为王之事。《外戚传》中的吕后,在刘邦死后大肆杀戮其生前宠妃,人彘戚夫人,杀赵王如意;同时,为稳固吕氏家族利益,吕后以外孙女赐婚儿子惠帝,以吕家诸侄孙女赐婚刘氏皇子,幽死刘友,逼死刘恢。班固将吕后的这些事迹放入《外戚传》中,虽有为吕后避讳之因,但也可从另一层面见出,吕后的这些所作所为,是因其皇后、太后等一系列帝王后宫女性身份造成的,而非出于政治原因,因为《外戚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皇帝的后妃及后妃家族中居高位或有大功者等一类人的传记。如此一来,班固就将吕后身为女主和女人的身份分割开。在《外戚传》中,班固刻画了一位极为残忍刻毒的帝后,同时又提出了心中理想的帝后人选:“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sup>[4](P4011)</sup>班固明确赞扬的帝后有四位:孝文帝母薄太后、孝景帝母窦太后、

孝武帝母王太后及元帝所尊邛成太后(无子,非元帝生母)。这四位太后皆出生卑微,历尽艰辛,凭一己之力,或助丈夫匡天下,或保儿子继大统,多为贤德之事,谨小慎微,最后使自己的家族也跟着富贵显耀。如此,班固就借助对四位太后的赞扬,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批判了吕后为帝后时的所作所为。

## 二、《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异同的原因

司马迁和班固记载历史人物皆秉承实录精神,所以他们笔下的吕后事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二人皆出生于史官家庭,均具有较高的良史素质,都注意到了吕后在汉初政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都将吕后列入本纪中。他们在肯定吕后称制期间所推行的系列惠民利国政策的同时,并没有掩盖吕后的秽政,虽在具体处理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总体事件的记录上却是相同的。

司马迁和班固生活时代的差异,使二人的女性观有所不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刚经历了秦朝的暴政,社会虽呈现出大一统趋势,但思想并未完全统一。汉武帝虽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但意识形态的转变需要循序渐进。在此背景下,司马迁对吕后的肯定,既因吕后在汉初政治中突出的地位,也源于他对吕后政治才能的赏识,所以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不仅记录了吕后称制期间的事迹,更赞赏吕后隐忍刚毅的性格。班固生活的东汉之际,儒术独尊,经学大盛,班固又出身于儒学世家,受儒学影响至深,故《汉书》以儒家思想为准则,凡不符合儒家要求的行为,就会被舍弃或置于非主体部分。因此之故,《高后纪》所记吕后之事主要以其称制后为主,且多为惠民利国之事,而吕后众多不符合儒家仁政理念的阴暗事迹,则被班固移出本纪。在班固笔下,吕后身为女主和帝后的身份是分离的。班固似乎不想让吕后为帝后时的残忍刻毒,损毁他所精心塑造的惠民女主形象。此外,班固生活的东汉时期,外戚势力对政治的干预程度远超司马迁时代,所以他把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的《外戚世家》改为了《外戚传》,专门记载皇帝后妃等外戚,且借赞扬多为贤德之事谨小慎微的帝后,以从侧面否定身为帝后的吕后。可见,班固的女性观也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准的。

司马迁和班固个人经历的不同,使其对理想君王的期冀也有很大的差异。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祸下狱,身受宫刑,发愤著书,故《史记》融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他既欣赏吕后的政治才干,赞扬其隐忍

刚毅的品格,又不满其残忍刻毒。身受宫刑的司马迁,亲身体会了在上者对其命运的残忍和人身的戕害。他将吕后的阴暗面录入《吕太后本纪》之中,是他愤恨于吕后的残忍暴行,期冀在上者当仁爱下民意图的显现。相较司马迁,班固的个人经历则十分幸运。他虽然也因私修国史而被人告发下狱,却得汉明帝赏识,拜为兰台令,正式掌管校定皇家图书<sup>[5](P1334)</sup>,故其对在上者抱有期冀之心,作《汉书》时,便多在本纪中宣扬在上者的贤德,故《高后纪》所载吕后实属贤德之主。

司马迁和班固修史目的的迥异,使其记载吕后事迹时存个人主观考量。司马迁明言,自己作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sup>[2](P2735)</sup>,所以他注重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整体反观人物,重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注意到了吕后前期对刘邦的隐忍付出,到后来却没能得到刘邦平等回应所积下的心理怨恨,以及她因想拼命保住太子之位,而在刘邦死后毒杀其宠妃爱子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他把这些事件都记入《吕太后本纪》中,以图完整地展示一代女主的成长过程,探索诸多事件之间所蕴含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sup>[4](P4235)</sup>明言自己作《汉书》的使命就是追述汉朝功德。这样的修史目的,使其自然不能多选择不利于展现汉朝繁荣昌盛的材料,更不能

能将这些材料置于本纪这种重要体例之中。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班固之所以在《惠帝纪》《高后纪》中改用提挈挈领的编年体,不惜将惠帝及吕后个人的行为架空,并以此成为他自己编帝纪的成法,但不愿放过吕后,所以又在《外戚传》中重出,大概他认为此可以保持帝统的面子,以符合‘尊汉’的用心,且可以减少他在帝纪叙述中所冒的危险。”<sup>[6](P297)</sup>可见班固在《高后纪》中忽略吕后残忍的一面的做法,与其追述汉朝功德的修史目的紧密相连。

历史总是生活的记载和反映。吕后这一人物形象在《史记》《汉书》中的异同,既源于修史者主观价值取向的不同,也源于修史者个人经历的不同,以及其所处时代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是修史者源于家学出身所形成的个人情感的体现,更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文化背景的凸显。这就提示我们,只有将历史人物放入历史环境中去具体考察,方能正确认识历史人物。

#### 参考文献:

- [1]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Lv Hou's Image and Its Reasons in *Shi Ji* and *Han Shu*

Li J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 Chun 130024)

**Abstract:** Both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put Queen Lv in biographic sketches, the description of Lv Hou's deeds is basically the same, bu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depiction of specific images. The former is not only a woman's forbearance and fortitude, but also a woman's talent and cruelty, the latter's identity of the woman and the queen was separated. As a female leader, Lv Hou's talent was outstanding, benefiting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But as a queen, she was cruel and malicious. The common record spirit of the two books has made Si Maqian and Ban Gu are basically the same in recording Lv Hou's deeds, whil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wo people's life time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historical purposes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in the image of the two books.

**Key word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Lv Hou